



湖北省学术著作

Hubel Special Funds for Academic Publications 出版专项资金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 东林党学术档案

周 群 高晓敏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湖北省学术著作

Hubei Special Funds for Academic Publications 出版专项资金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 东林党学术档案

周 群 高晓敏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林党学术档案/周群,高晓敏主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2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陈文新主编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ISBN 978-7-307-20353-2

I.东… II.①周… ②高… III.东林党—研究 IV.K248.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5590号

责任编辑:陈帆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汪冰滢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5 字数:223千字 插页:1

版次: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353-2 定价:6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近百年东林党研究述要(代前言)

### (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sup>①</sup>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将士人之身与道浑融为一，这既为士大夫个体之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要求和历史的担当，同时也将个体生命赋予了悲壮的色彩。孟子为士人提出了高峻的人格理想，随着理学的产生，儒家道德理性的不断增强，激励着一代代志士为了国运民生而不懈奋斗，乃至以身相殉，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悲歌，为民族精神注入了凛然不可侵夺的正气。迨至明清易代之际，无锡东林书院的一堂师友，于大厦将倾之际，以血肉相撑拒，写就了以身殉道的悲壮一页，践行了孟子提出的人格理想。同时，在其后的数百年中，一代代学人们见仁见智，讨论“东林”这一带有悲情色彩的历史话题。

东林党，是由明末时期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组成的政治派别，名字来源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建于今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其领袖为当时的在野清流顾宪成与高攀龙等。顾、高等人以直言敢谏触怒当局，被贬回乡，仕途无望。回乡后开始了讲学活动，并重修宋代大儒杨时留下的东林书院，作为讲学之地。他们以讲学活动为中心，讲学之余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

---

<sup>①</sup> 孟子著，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尽心章句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1页。

时者，率退处林野，闻声响附，学舍至而不能容”<sup>①</sup>，队伍逐渐扩大，吸引了一批在野名士和在朝官员，逐渐形成了一股对朝政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和民间舆论力量。书院的一副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深入每一个正直的士大夫内心，成为他们的殷殷为国之情、拳拳为民之心的最好写照，同时也成为这批虽“居水边林下”，但仍然“志在世道”的儒士共同奋斗的宗旨。

东林党正是以这样“明道救业”的政治方针，在明末时期引发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并被冠以“东林党争”。这场政治风云产生于国运衰微之时，同时也在与皇权专制的斗争中逐渐壮大，最后也是为皇权所灭。晚明时期的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身。与明初朱元璋废除中书省欲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权力分割的目的相比，这时的国家权力则演变成了皇帝实现私欲的工具。万历皇帝欲废东宫太子而改立爱妃之子为太子，将个人的私心喜好置国本大事之上，遭到了群臣非议。万历二十一年（1593），顾宪成正是因不满明神宗“三皇并封”的缓兵之计而上《建储重典国本攸关疏》，严厉斥责帝王私欲，遂为明神宗所恨。同时又因推神宗反感的正直官员王家屏入阁而触怒圣颜，隔年便遭到削职为民。可见万历朝的政治抉择和官员任职唯以皇帝的喜好为准。万历朝中期，贪财好物的万历皇帝又开始派遣大批宦官以“矿税”的名义在全国掠夺财物，致使民不聊生，名义上的矿监税使所到之处必是民怨载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中尤对城市富户商人和乡村大户的掠夺最为严重。使富人变穷，穷人更穷。这样的无限掠夺引起了神宗与群臣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抗争，直到神宗去世才结束。同时，万历皇帝在其执政后期居于深宫，长达28年不上朝。虽然号称“万历三大征”的战役全部取得了胜利，但同时也是丧师无数，耗空国库，生灵涂炭，国力一步一步由盛转衰，故有“明之

---

①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29页。

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sup>①</sup>。神宗之子光宗即位不足一月便突然逝去，继之而立的明熹宗长期不理朝政，政权旁落于大宦官魏忠贤。东林党在与阉党的斗争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明末全国农民起义不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思想界游谈无根，空谈心性、轻视实事实功之风盛行。这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时代，给各种政治势力提供了参与政事、施展政治抱负的时机。东林党作为江南地区士大夫政治利益的代表，与当时的齐党、楚党、浙党以及天启年间盛极一时的皇家专制政权的代表者阉党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冲突。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或利益斗争或政见不和，更加重了晚明的社会危机。晚明的党争也成为饱受争议和诟病的复杂的历史现象，一腔热情、怀抱殉道理想的东林人士亦深陷于这一历史旋涡之中，成为史家论争、品评的重要课题。

但是，对于东林党这个集学术思想、讲学活动、政治参与于一体的复杂群体，要准确地厘定其历史地位，评价其得与失，并非易事。这需要涉及晚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需要仔细考察东林党的形成过程、成员组成，深入分析他们秉持的儒家文化传统，以及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甚至还要仔细考察他们的政治对手等。只有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同情理解的历史态度来考察东林党的历史，才能准确地判断这一政治团体的历史功过。

## (二)

党争是中国历代王朝衰微时期常常会出现的政治现象。相较于其他朝代的党争事件，明末的东林党争更是备受人们的关注。对东林党的评价由于不同学者视角与研究方法的不同，结论往往相去甚远，甚至呈现针锋相对的势态：如果从党争与明王朝的兴亡视角来考察，对东林党的评价则负面，大体持有东林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而不顾国运大局的观点；如果从东林党时期的政治、学术作用来考察，则多以

---

① (清)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502页。

正面肯定为主。凡此种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我们从晚近以来对东林党的评价进行简要的历时梳理。

首先，清末民初时期对东林党的评价。20世纪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王朝已是千疮百孔，古老的中华大地饱受列强的蹂躏。孙中山应时而兴，借用西方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并以明末清初遗民浓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与观念作为当代革命的精神依托。孙中山多次谒明孝陵，刺激着长期被满族统治下的汉民族痛楚贡张的神经。这一独特的历史情绪也影响到了20世纪初期的历史研究，对明末清初的史学研究一度备受重视。东林党也受到了关注。

谢国桢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是这一领域较早的作品，堪称是党社研究方面的经典和奠基之作。作者撰写此书，一方面是为了明确“党”与“社”在政治和社会上的重要性，考察党社与辛亥革命、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和当时中国战乱频仍的国运相应和，以砥砺中华民族之精神。该书以明清之际的党社研究为切入点，系统地考证了东林党与齐、楚、浙、阉党在明末时的党争，并考证了其复社等党社的始末，以此对明代的政治格局及灭亡原因进行了探讨，展示了明末清初的历史概貌。对于党争，谢氏认为这与明朝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内阁制度庸弱有直接关系。东林党在党争中也难辞其咎。同时，谢氏对他们所代表的民主自觉的意识给予了褒赞，将其作为政治进步、值得肯定的先进代表。此书出版的次年，鲁迅先生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谓其“钩索文籍，用力甚勤”<sup>①</sup>。谢氏此书开了明末党争研究尤其是东林党研究的先河。另外，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1933年版)一书的卷四、卷五列有大量关于明末清初党争之史料，给后来者研究东林党奠定了丰富的史籍基础。与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同年出版的还有王耘壮的《东林与复社》(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版)，此书以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文秉的《定陵注略》和大量传记等史料为主要参考对象，从张居正夺情案叙起，对东林党争之来龙去脉进

<sup>①</sup> 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86页。

行了详尽勾勒,是了解东林党以及晚明党争主要史事的著作。

20世纪4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朱希祖先生之女朱倓《明季社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的出版又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增添了一部力作。该书中关于东林党研究的部分,作者将义愤之情化为手中鸣冤之笔,为东林党的遭遇鸣不平。书中考证了《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以及东林党人的著述,用力深厚,考证详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嵇文甫1943年7月发表于《力行》上的《东林派与王学修正运动》(这篇论文后编入他的《晚明思想史论》一书)。该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东林学派的思想主张和历史地位进行了独特的探讨,认为“东林学派在学术立场上,表现出从王返朱的倾向。但实际上,他的学风终不类朱,而倒和王学右派相接近,是‘遵德性’一路,而不是‘道问学’一路”。因此,“东林学派只是王学修正派,而不可说为王学反对派”<sup>①</sup>。这一观点堪称是嵇氏所创。同时期还有风人在《大公报》(上海)上发表的6篇关于东林党的论文。总体而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东林党在政治、社会、思想各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关于东林党历史资料考证方面的成就也始于这一时期。

从1949年至1966年“文革”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林党研究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成为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思想。在其引导下,出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开始脱离实证学风而努力学习适应时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为主。在党社研究方面,研究者开始探讨东林党人的阶级性质、社会基础、政治主张和道德思想等问题,形成了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实证考察特色截然不同的学术倾向。侯外庐的《论明清之际的社会阶级关系与启蒙思潮的特点》(《新建设》1955年第5期)及其《中国思想通史》一书的第25章《东林党争的历史意义及其社会思想》、李洵的《试论明末东林党的形成》(《历史教学》1955年第10期)、陈鸣钟的《万历年间东林党的斗争》(《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6期)、左云鹏与刘重日合作的《明代东林党争的社会背景及其与市民运动的关系》(《新建设》1957年第10期)、江庭苏的《论东林党政治主张的阶级

<sup>①</sup>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性》(1966年2月23日《光明日报》)等文,正是在新思想的引导下,将东林党研究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的学者大多认为东林党产生于明朝中期以后封建社会危机重重之时,它的产生与政治上的专制皇权、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都有很大的关系。明王朝建立以后对江南地主长期施行经济压制的的不平等政策,东林党中不少成员出身于商人世家或者自己从事商业,故他们反对贵族大地主的专制。他们不仅代表了江南地区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且代表了城市新兴平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此他们所提出的政治、经济主张具有双重的利益代表性,获得了中小地主和城市平民的两重支持与拥护,这呈现出与历代党争不同的特色。这一时期的东林党研究在主流研究方法之外,还有个别实证考察的著作,即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桢论著《东林党籍考》,书中收集了288个东林党人的传记资料。这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实证派的继续。

“文革”十年浩劫,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史学研究逐步教条化、庸俗化,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纷纷抛弃极“左”思想的影响而重新审视历史与当下。史学界关于东林党研究在新时期也大胆地提出了很多新颖观点,研究更为深入,视角不断扩展,进入了20世纪以来东林党研究的繁盛期。这一时期的研究继承了“文革”前对东林党阶级分析研究的方法,对东林党的历史作用亦以肯定为主。但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反思东林党,出现了东林党的贬评之声,这一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哗然。

肯定派如朱文杰的《东林党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王天有的《晚明东林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二者是肯定东林党的阶级性质、历史作用的两部力作。《东林党史话》对东林党史事作了十分详尽的展现。全书认同以张居正“夺情案”为叙述的起点,认为东林党维护封建国家利益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晚明东林党议》是东林党研究领域里分量极重的论著,全书以10余万字把东林党置于明末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中,深入探讨其功过是非。不仅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东林党,同时对东林党的史事也多有考证,钩索用力深厚。作者认可东林党的历史作用,并

表明东林党这个改良派的最终失败说明了此时明王朝已腐朽不堪,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救已无济于事。王天有之师许大龄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收录于《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文,延续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了东林党人的性质,认为他们是中小地主阶级和城市平民阶级的利益代表,在当时是极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作者同时指出,思想方面由于他们尊程朱而反王学,抵制李贽等狂禅派的狂放之行,反对越出封建礼教思想和行动,因此又是具有局限性的。韩大成《天启时东林党人失败的教训》(收录于《明史研究第4辑——庆贺王毓铨先生85华诞暨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专辑》,黄山书社1994年版)一文,认为东林党人在政治斗争策略上的失误是致使他们失败的关键。他们没有形成一致的纲领章程、组织纪律。在党争后期,内部鱼龙混杂,与敌党过于壁垒森严,最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东林党人的高风亮节、惩贪治吏在明末时期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因此对东林党人的道德风尚予以高度肯定。

否定派以刘志琴的《论东林党的兴亡》(《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和《剑桥中国明代史》一书第九章黄仁宇作的《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为代表。刘氏通过分析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及他们当政后的行为,认为东林党人尊经重道的救世思想和政治主张,与万历初年张居正注重实效、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革新思想相比,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封建制度日趋解体的情况下,这无疑是起到了反动的作用。1998年刘氏又参加在无锡举办的“东林党学术研讨会、薛福成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她作了《东林悲歌千古绝唱》的报告,虽然文中表达了对东林精神的崇敬,但是仍然基本秉持了此前的观点。黄氏的著作则更为激切和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东林党政治改革的否定。他认为这一集团派系“只是道德上的批判者”,在体制上、谋略上毫无能力可言,“赴义所隐含的吸引力满足了那些东林追随者,他们喜欢这个在失败和挫折的时代不公正地被迫害的高尚运动”,与东林党之前的高拱和张居正相比是巨大的退步。同时,作者认为历来东林党的研究者“把个人道

德等同于行政才能”<sup>①</sup>，过分强调研究对象的品性，而导致扭曲了研究者自身的研究角度和观察力、分析力。黄氏这一观点否定了 20 世纪以来对东林党历史作用方面的主流观点和研究态度与方法。

这一时期，除了延续对东林党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作用进行考察分析之外，对东林党的研究还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首先，在东林党人物研究方面。冷东将历来被称为东林党魁首的叶向高作为研究重点，出版了专著《叶向高与明末政坛》（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并发表《叶向高与东林党》（《东北师大学报》1998 年第 1 期）等论文。这些成果探讨了其与东林党人真正的关系，得出叶向高并非东林党人的结论。其次，以历史地理的视角对东林党人进行地域性的考察。郑克晟《明代的江南士大夫与东林党人》（《江南论坛》1994 年第 6 期）考察了东林党与江南的关系，田培栋的《明后期山陕东林党人的反腐朽斗争》（《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 年第 3 期）和张显清的《明末北直清流派的构成及其反阉党斗争》（收录于《明史研究》第 3 辑，黄山书社 1993 年版）也考察了以前很少有人关注的山西、陕西、北直隶等地东林党人的事迹。再次，在东林学派思想研究方面，步近智对东林学派的思想进行了诸多的探讨与阐述，并与张安奇共同撰成《顾宪成高攀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该书总体认可东林学派是程朱理学的延续，同时提出东林学派在中国实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将实学视为理学、心学之外新的儒学发展方向，并指出其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先导。

进入 21 世纪，东林党研究又有新的突破。一些颠覆性的新颖的学术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2001 年樊树志发表的两篇论文《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2 期）和《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2001 年第 1 期）（两篇论文收入其《晚明史》专著之中）通过历史资料的考证，认为东林书院是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创办的一个以阐明理学为宗旨的学校，在讲学过程中并不涉及议论时政、褒贬人物等内容，也未遥执朝政，与李三

<sup>①</sup> 黄仁宇：《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剑桥中国明代史》第九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4 页。

才、叶向高等人并未创立任何党派性组织。而“东林党”只不过是在万历辛亥京察中被其他官僚诬指而已，是他党人物虚构出来的。顾、高等人本身既不是一个党派，也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他们只是明末时期一群重整道德的书院讲学学者。而在樊树志之前，牛建强已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在《明后期政界之纷争——兼论东林学派政争之非直接介入》(《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中，他提出“东林人士未必是党，而是异己者强行给扣上的一项厌恶的帽子”<sup>①</sup>，但由于并未经过论证，故未引起过多的关注。至樊树志发表了这一观点之后，质疑声也随之而起。明确提出反对的有李庆的《“东林非党论”质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商传的《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驳斥东林书院“不评议朝政，褒贬人物”观点的则有张宪博《东林党、复社与晚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4年5月18日)一文。而响应樊树志观点的也有金奋飞《读书·静坐·会友——明末东林书院日常生活暨讲学教育活动述略》(收录于《东林书院重修4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和张秉国《“东林非党论”质疑的质疑》(《聊城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至此，对于东林党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阶级性质、历史作用等范畴，而是对“东林党”本身提出了质疑。这一阶段是东林党研究空前活跃的时期。

同时，21世纪的学者们也开始尝试以新的研究方法来考察东林党。其一，将史学与文学相融合，观察东林党议在文学上的影响。张永刚的《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其中包括了他之前发表过的多篇相关论文。其二，以东林书院为东林学派的研究中心。以陈时龙的《晚明书院结群现象研究——东林书院网络的构成、宗旨与形成》(《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一文为代表。其三，用心理、心态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东林党人政治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葛荃《晚明东林党人“生命意识”析论——关

---

① 牛建强：《明后期政界之纷争——兼论东林学派政争之非直接介入》，《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

于士人精神的一种政治文化阐释》(《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作为政治人格的狂狷、乡愿与伪君子——以晚明东林诸君见解为据》(《东岳论丛》2008年第6期)两文,言前人之未言,从精神意识和政治人格的角度分析了东林党人的内心世界,得出了东林党人普遍具有儒士遵道精神和狂狷品性的结论,观点新颖,独辟蹊径。

纵观20世纪以来学界对东林党的研究,经历了早期的考证阶段、中期的唯物史观阶段以及新时期后思想解放、新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层出不穷的阶段。各家观点交相辉映,对东林党的认识逐渐深入,研究视野不断拓展。

我国台湾地区在东林党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台湾学界在党社研究方面榛莽初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产生了诸多的力作。沈忱农、雷飞龙、王止钧、陈圣士、古清美、林丽月、潘实坚等人都作了相关研究,其中尤以林丽月、古清美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古清美在1983年对东林的讲学之风与道德精神作过探讨,并于2004年出版了专著《顾泾阳、高景逸学术思想之比较》,分析了东林领袖顾、高思想之异同。林丽月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末东林运动新探》,也对东林党进行了新的探索。她一方面全面考察了东林党人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从制度层面、政治思想层面对他们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其中尤其重视东林党人自由自主精神的倡导,对东林党人的历史地位予以较高评价。

海外学者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关注东林党的研究。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学者贺凯(Charles O. Hucker)的《晚明东林运动》(收录于费正清主编的《中国思想与制度》,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in John K. Fairbank (ed.), 1957, pp. 132-162)和德国汉学家卜恩礼(Heinrich Busch)的《东林书院与它的政治、哲学意义》*The tung-lin academy and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收录于《华裔学志》, 1955)是欧美史学界这一方面较早的研究成果。国外对东林党研究最为深入的是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岛田虔次、沟口雄三、小野和子、荒木见悟、鹤成九章都对东林党研究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小野和子对东林党的政治思想、党内成员、形成过程作了充分的史料考察,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有多篇研究论文发表,是日本史

学界在东林党研究方面成果较为丰硕的学者。她主要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入手,更为重视东林党人“天下为公”的思想,认为他们是由一群正直君子所组成的旨在开言路、追求天下之公的朝廷“公党”<sup>①</sup>,对东林党予以高度评价。其他学者多集中于对东林学派学术思想的探讨,其中又以沟口雄三的观点最引人瞩目。沟口雄三的论文《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75册,1978)深入地阐发了东林的思想内涵,并提出了影响巨大的“前近代思想”论,认为东林党人就是中国“前近代思想”的重要代表,对东林党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 (三)

纵观东林党学术百年,众说纷呈,新见迭出。兹根据对东林党研究的焦点不同,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东林党的阶级性质、社会基础与历史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随着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深入,东林党研究方面也开始纷纷关注其阶级性质、社会基础等方面的内容。侯外庐认为东林党“代表了中等阶级反对派的利益,其中有不少人出身于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工商业者家庭”<sup>②</sup>。李洵指出东林党是“江南中小地主与城市反封建的中等阶级趋向的联盟”<sup>③</sup>。左云鹏通过对当时社会背景及东林党人与城市市民之间关系的逐步分析,最后认为他们代表了“江浙地区非身份性地主与商人阶级利益”<sup>④</sup>。总体而言,在东林党的阶级性质和社会基础上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东林党人大多是中小地主出身,或者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反对贵族大地主对中小地主、平民的剥

① [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②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05页。

③ 李洵:《试论东林党的形成》,《历史教学》1955年第10期。

④ 左云鹏、刘重日:《明代东林党的社会背景及其与市民运动的关系》,《新建设》1957年10月。

削，同时他们站在市民的立场上与之形成统一战线。在封建社会末期，他们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和城市平民的双重利益。

但自新时期开始，曾被广泛运用的阶级分析方法开始受到怀疑与反思。夏维中在他的《关于东林党的几点思考》一文中首先拒绝研究态度的绝对化与单一化，并用史料有力地回击了研究史上的一些主流观点；对于阶级分析方法本身，他也鲜明地指出，“在借用外国的某些特定概念时，也不应把这些概念从他们的历史来源中切断，而无视其复杂性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演变出来的内涵和性格，更不应随便把外国环境中因特殊背景和问题发展起来的东西当作我们的权威，否则就容易产生形式主义的谬误”<sup>①</sup>。

## 第二，东林党的历史作用。

这是对东林党研究分歧最为明显的领域。东林党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肯定一派以侯外庐、李洵、王天有、许大龄、左云鹏、小野和子、沟口雄三等为代表。侯外庐认为东林党属于“地主阶级的反对派”，他们“利用数百年来就存在的书院形式，作为进行政治活动的基地，作为联络组织‘同志’的场所”，“具有改革经院，推翻偶像的进步作用”。他们反抗专制制度，代表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进步思潮。李洵认为东林党的斗争是中小地主或地主阶级改革派反对贵族大地主对江南地主势力的斗争，是反专制、反皇权的斗争。他们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除贵族大地主对江南地主势力和城市势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重压迫。王天有否定了明末就产生的贬斥东林党的声音，明确表示自己站在黄宗羲的立场上，认为东林党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曾起到了重大历史作用。他们不是明朝灭亡的原因，在明末政坛中他们的正直作用不容忽视。沟口雄三给予了东林党人代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高度历史评价。

否定派则以刘志琴和黄仁宇为代表。刘志琴认为，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作为相较于张居正是一种倒退，而黄仁宇更是严厉地指出东林

<sup>①</sup> 夏维中：《关于东林党的几点思考》，《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党人只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技术上、策略上的投入者,他们“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他们只希望除去那些在他们心目中品性有缺陷的官员”。<sup>①</sup> 黄仁宇堪称是对东林党贬斥最有力的学者。

第三,东林党是否为党。

这一话题在 21 世纪东林研究领域乃至明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其实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就认为东林党不是一个政治派别,“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然东林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sup>②</sup>黄氏以其亲眼所睹、亲耳所闻为东林开脱政治团体之名,然而这样的观点在当时以及后世很少有人响应。2001 年,樊树志先后发表两篇论文以新的史料论证了“东林非党”的观点,打破了学界长期公认的东林党为一政治团体也即“朋党论”的传统观点。随之李庆、商传都给予了回击,对樊氏观点一一进行了质疑。而金奋飞、张秉国则强烈支持“东林非党论”。双方针锋相对,共同推动了东林研究的繁荣。

第四,东林学派研究。

最早提出“东林学派”说法的是黄宗羲。黄氏否定东林为一“党”之说,认为他们不过是一郡内之讲学书院。在《明儒学案》中以四卷的篇幅对东林学派中 17 人的思想进行了精要概述。20 世纪以来,较早对东林学派进行研究的是嵇文甫的《东林派与王学修正运动》,作者认为东林学派不是王学的反对派,而应该归入王学修正派一类,与王学右派有很高的相似度。在思想传承上,东林学派并不全是朱学的思想。其领袖顾宪成、高攀龙等早年都师从王学,受到了王学的影响,他们并不是全然否定王学。钱穆的《顾泾阳、高景逸学述》(《东方杂志》,1975 年复刊第 8 卷第 11、12 期)一文论述顾、高二人的学术思想,并在《中国近三百年之学术》一书的引论中论及东林学派,

<sup>①</sup> 黄仁宇:《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剑桥中国明代史》第九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4 页。

<sup>②</sup>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一》,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375 页。

言“宋元明三百年讲学史，以东林为殿”，而“明清之际，学者流风余韵，尤往往沿东林”<sup>①</sup>，视东林学派为其后思想发展之先导。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之《原性篇》与《原教篇》（新亚研究会，1979）中述及东林学派的思想，认为他们是救王学之弊而起。对东林学派哲学思想的研究除了从学派入手分析，学界还对东林学派中的领袖进行更为具体的探讨，其中尤以对高攀龙的研究最为具体、深入。何孝荣、周学军等学者发表了多篇论文，以高攀龙的哲学思想为研究重点，对高攀龙的朱学、王学、佛学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对东林学派的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学者对东林的实学思想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东林学派继朱学、王学之后，在危机重重的晚明时期，勇担救亡图存、励精图治的重担，以实学思想影响社会。步近智先后发表了《明末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文史哲》1985年第5期）、《东林学派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略论明清实学思潮及其现实意义》（《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等多篇论文，认为东林学派延续了儒学“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致用传统，“以能否治世、有用作为评价衡量一切思想学说的标准和尺度”<sup>②</sup>，反对空疏之言，反对经院哲学，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切实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步近智认为东林“实开明清之际实学高潮之端绪”，对继之而起的复社有很重要的影响。

另外，东林是否具有启蒙思想、自主精神，它是否为中国早期民主思潮的先驱这一问题也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谢国桢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提出“党争的发生，至少是一种人民自觉的现象”<sup>③</sup>，以“自觉”一词点出了人民自主的含义，发前人之未发。侯外庐、步近智、张宪博等也充分肯定了东林党在对抗皇权专制斗争的政治行为背后的自主意识。我国台湾地区的林丽月和日本的小野和子将东林党放在“公”的位置上，对他们在封建社会中的自主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日本的沟口雄三更是将东林学派的思想提高到“前近代”思想的重要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

② 步近智：《明末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文史哲》1985年第5期。

③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